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1966年毛澤東發動席卷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距今剛滿半個世紀。期間發生的各類事件千頭萬緒，有待爬梳整理。《二十一世紀》向來支持文革研究，持續刊發相關文章。6月號和8月號將會推出專輯，分別從政治、社會、文化等多維視角，重構文革的方方面面。期待讀者惠稿，提出建設性的觀點。

——編者

神話背後的中朝關係

沈志華的〈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正劇〉（《二十一世紀》2016年2月號）一文認為，決定「八月事件」成敗之關鍵端賴蘇聯的取態，可謂「成也蘇聯，敗也蘇聯」。這自然與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權力運作邏輯相關。蘇共建制後，對內，國家成為黨組織模式的投射與放大，從而造就一種獨特的社會主義「黨一國」體制；對外，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踐行是黨際關係中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而這種類同公轉與自轉的人身依附關係，必然引致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聯動效果：「蘇共二十大」促發了「八月事件」，解鈴還須繫

鈴人，其收場自然也需蘇聯的及時「滅火」。此等關係模式，對於國際共運之發展與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與「蘇共二十大」的效應類似，遵從甚至屈從這種綁定型關係的東歐衛星國，在1980年代面對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新思維」改革，再次陷入意識形態認同混亂，最終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而未遵從這種不對等關係定位的中國以及在中蘇之間來回搖擺的國家（朝鮮與越南），反而走上了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歷蘇東劇變的浪潮侵襲後，至少在形式上仍保持着紅旗飄揚，屹立不倒。

沈先生研究中朝關係的系列論文，名為研究金日成如何實現政治上位，實則也為我們理解當下弔詭的中朝關係提供深度的歷史解讀。事實上，只有將這種關係置於中蘇之間展開的博弈中以及社會主義陣營格局變化的背景下，方可給予妥適說明。可以說，金日成之所以能登上權力頂峰，在於他善於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作為內部派系之爭的「八月事件」，伴隨着「延安派」逃往中國而演變成社會主義陣營內部

的政治爭鬥，中朝關係一時陷入危機；波匈事件後，毛澤東認為出現「蘇修」苗頭，對蘇共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能力產生懷疑。為了建立和擴大與蘇聯競爭的優勢，中共對朝改用友好方針。毛澤東不僅容忍金日成對「延安派」的打擊和迫害，而且還撤回在朝志願軍。在此等格局下，金日成因勢利導地利用中蘇矛盾（1961年與中蘇分別簽訂內容相同的同盟條約，即為典型體現），兩邊取利，既可清除異己，更可獲得集體安全保障與經濟援助，最終成就了自身不可挑戰的統治地位。這種騎牆模式持續至今。

質言之，在用鮮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傳統友誼這一宣傳話語的掩蓋下，中朝關係實際上一直存在張力，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政治聯姻」。鑒於往事，資於治道。沈先生的研究，最終目的是表明中朝所謂「唇齒相依」的兄弟關係，只是一種基於特定時代意識形態所需的話語建構，只是一個玫瑰色的歷史神話。

魏磊杰 廈門

2016.2.22

把「自由」歸還給農村人口

或許是曾在浙江生活、工作的緣故，近年每每讀到來自浙江台州的潘學方那些「接地气」的大塊文章時，我都有一種親切之感。潘的新作〈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與土地生存保障問題〉（《二十一世紀》

2016年2月號)以2014年開始的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度改革為例,探討了土地的生存保障作用及地權的代際公平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他認為一小塊農耕地對農戶起不到基本的生存保障作用;解決農村人口的生存保障乃在於建立城鄉相對平等以至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就要掃除農民進城的制度障礙,並把「帶着土地離開集體的自由」歸還給農村人口,而股份合作制改革為此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途徑。

潘文實際上涉及了1978年改革以來尚未觸動的城鄉二元分隔的社會結構之徹底改革問題。這一社會結構從1950年代形成後,使曾經享有絕大多數消極自由的農村人口,一度變成「準農奴」,承受了可怕的負擔和巨大的犧牲,為1950至1970年代國家的初步工業化提供資本積累,為其後幾十年中國經濟經由全球化起飛提供了廉價勞力。今天,無論從道德高度或者補償原則來看,都到了把「自由」歸還給農村人口的時候了。

具體怎麼改,目下還有很多爭議。潘文有分析,有建議。其實,潘文提出的建立城鄉相對平等乃至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願景目標,在中國大陸周邊的日本、韓國、台灣都已實現,他們走過的路,可以作為進一步的借鑒。因為僅僅在幾代人之前,這幾個地方與中國大陸農村人口的生活差距還不是太大。再經過一二代,他們會殊途同歸嗎?潘文

為此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路徑,值得研究者和決策者參考。

梁加農 加拿大列治文山

2016.3.3

高爾基形象與中共歷史敘事的「層累」

郭國昌的〈「文學旗手」的樹立——解放區語境中的高爾基形象建構〉(《二十一世紀》2016年2月號)一文,指出高爾基(Maksim Gorky)如何由一個充滿矛盾和張力的作家,成為了解放區「工農兵文藝」的楷模。郭文意在說明高爾基形象建構背後的政治動因,進而展示了中共文藝和政治的糾葛關係。

根據郭國昌的論證,在左聯時期(1930-1936),高爾基是作為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出現,這與左聯的文學戰鬥性關聯。在延安時期(1937-1947),毛澤東的講話使得高爾基形象建構駛入政治快車道,凸顯其鬥爭性和政治性,反映了中共對解放區文藝戰士改造的緊迫要求。

郭國昌借助高爾基形象這一歷史敘述提醒我們:中共黨史敘事主線是隨着政治大勢而轉變的。此外,正如郭文中提及的胡風、王實味等「另類」,他們總是跟不上中共主流。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在左聯和中共高層強勢建構高爾基形象之外,我們如何來捕捉、呈現和闡發胡風、王實味等所散發出的「執拗的、被壓抑的低音」(王汎森:《執拗的低音》)的歷史意涵。

楊龍 香港

2016.2.21

「打土豪」:紅軍革命的早期實踐

任偉的〈「打土豪」:紅軍早期糧食的獲取及其困境〉(《二十一世紀》2016年2月號)一文,不僅詳盡地展示了中共「打土豪」的全過程,還揭示了「打土豪」的弊端——體現在以「打土豪」方式的供給制不穩定(暴富暴貧),沒有可持續性(土豪總有打盡之時),同時還摧毀傳統的勞動致富信念。本來是為解決財源困境的「打土豪」,最終卻成為導致紅軍陷入財源危機的重要因素。該文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於提供了一些新史料,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出來的對史實負責的態度:只有將「打土豪」的全過程以及正反兩面完整呈現,才是對歷史的尊重。

另外,也只有忠於歷史事實,才能有效地解讀歷史的邏輯,使信史得以建立。如果不理解紅軍根據地經濟如何走向崩潰(「打土豪」乃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難以理解革命根據地向稅收建設的轉型。

最後,該文給出一個重要啟示:革命並非如正史所宣傳的那樣——中共天生就知曉在甚麼時候出台何種政策,且總能取得積極成果。根據地一開始奉行「不管何人,只要弄來錢即可」,以致軍紀、民心渙散。後來發現這樣做不利於革命事業的長期發展,才在全軍形成「打土豪」的共識和政策。因此,根據地的革命是中共為了生存,積極應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政策和實踐的產物。

劉培偉 泰安

2016.2.28